

汉日量词系统的对比研究：差异表征与成因溯源

康淑铭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DOI:10.61369/HASS.2026030020

摘 要：随着中日各领域交流日益密切，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内部结构的差异开始受到更多关注。量词在汉日两种语言中应用广泛，但实际搭配习惯却大相径庭。本文试图跳出单纯的词表对照，从分类逻辑和句法位置入手梳理两者的表层分歧，并进一步探讨导致了这些分歧的原因。文章认为，除了孤立项与黏着语在语法属性上的根本不同外，认知习惯上的“重形”与“重类”，以及中日文化中整体思维与细节思维的差异，共同塑造了今天的量词面貌。厘清这一点，对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实际语用失误有所启发。

关 键 词：中日量词；对比差异；文化因素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auses of Quantifiers Used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Kang Shum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Language,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quantifier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s a particularly prominent phenomenon.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classification logic,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collocation rul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s in morphological typology.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hidden behind the surface grammar, providing an explanatory path for pragmatic failur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hinese and Japanese quantifiers; comparative differences; culture factors

量词是用来规约数量概念的词。中日两国语言里都有庞大的量词系统，这也成了两国学习者在互相学习语言时的一个主要障碍。过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本体描写上，比如总结汉语有哪些个体量词、日语有哪些助数词。探讨中日量词的差异，在宏观层面有助于丰富类型学视野下的语言演变理论，在微观层面则对商务、旅游、教育等领域的跨文化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价值——掌握对象国语言的量词搭配逻辑，是避免语义冲突、提升交际精准度的前提^[1]。

一、汉日量词研究的历史演进与现状

汉藏语系语言普遍具有量词广泛使用的特征，尤以现代汉语为典型。相较于其他语言多将单位词限于度量衡范畴，汉语量词的覆盖面极广。然而，这一庞大系统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前，因古汉语量词数量较少且多为度量衡及货币单位，相关研究未能成体系，至今古汉语量词的演变脉络仍有待厘清^[2]。现代汉语语法学确立后，量词的独立词类地位才得以巩固，朱德熙等学者对其内部构造进行了细致切分，将其划分为个体、集合、度量、动量等子类，奠定了汉语量词分类的基调^[3]。

日语中的量词早期被称为“助数词”，《日本语教育大事典》将其定义为与数词结合构成数量表达的接辞类成分。相较于汉语，日语助数词的研究起步更侧重句法功能的探讨。山田孝雄在

《日本文法论》中率先界定其名词附属成分的语法地位；随后池上衞造的《助数词考》系统梳理了其起源与发展，成为该领域的里程碑。进入20世纪后期，研究视角逐渐向语义与语用拓展，饭田朝子指出日语数词极少单独使用，必须依赖助数词的特征，而冲久雄则从句法结构入手，分析了助数词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功能差异。总体而言，日语学界对助数词的探讨经历了从“语法地位确认”到“句法行为描写”的渐进过程。

二、中日量词对比研究的深化与转向

随着单语研究的深入，中日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双语的横向对比。早期的对比研究主要致力于搭建双边量词的对应框架。张麟声率先打破语种壁垒，从句法和语义双维度勾勒了汉日量词的

异同轮廓；李庆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拓展，按计量对象和用途提出了双轨分类法，极大推动了该领域的体系化建设^[4]。

然而，单纯的框架对应无法解释实际语用中的错位现象，近年的研究因此呈现出向具体词汇微观辨析及认知文化解释转向的趋势。例如，针对同形量词“枚”的溯源研究发现^[5]，其在古代汉语中曾是通用量词，现代汉语中适用范围大幅收缩，多局限于细长或小而圆物体；而在日语中，“枚”仍保持对扁平物品的宽泛计量，这种“同词异化”现象成为探讨语言演变的有效切口。此外，李晓媚从语源切入，对比了汉语“名量/动量”二分法与日语“和语/外来语”分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并梳理了部分量词的消亡与词义扩大现象^[6]。许玉岭则借助对应关系表格，实证考察了汉日个体、集体量词在搭配范围上的交叉与排斥，特别是日语拟声词与汉语动量词的特殊对应关联^[7]。从这些文献的演进可以看出，中日量词对比已从表层的静态分类，走向了动态的语用考察与认知解释，但针对二者搭配差异背后的深层逻辑机制，仍需进一步整合性探索。

三、中日语言量词的表层差异表征

（一）体系与用法分野

在计量核心功能上，汉日量词存在明显分歧。汉语量词体系以“名量词”与“动量词”为两大支柱：名量词标定事物单位（如“五口人”），动量词侧重动作频次（如“去两趟”）。其中名量词因与名词搭配缺乏绝对的对应该律，构成了汉语学习的难点。反观日语量词，学界多从语源角度将其分为固有量词（如“一つ”）、汉语系量词（如“冊、枚”）及外来语量词（如“メートル”）^[4]。尽管汉语借词在日语量词中占比极高，但受社会文化变迁影响，二者在语义边界上已发生显著偏移。

在句法组合层面，现有研究多孤立探讨数量结构与动宾或偏正短语的搭配。若将视角拓宽，借助语料库考察“遍、回”等高频词可以发现^[8]，汉语数量短语在句中极具灵活性，可充当主、谓、宾、定、状、补等多种成分；而日语量词由于黏着语特性，无法独立承担句法成分，且严格排斥指示词的插入，表达逻辑更为刚性。

（二）功能与修辞偏好

除基本计量外，汉日量词在附加功能上各有侧重。汉语的量词经常带着感情色彩，比如称呼“一位好老师”，这里的“位”已经脱离了计数功能，变成了一种敬称。日语量词的附加功能则更多是用来描绘事物本身的形象，或者表达说话人某种主观的情绪。

在修辞策略上，日语有“一缕の望み”，汉语也会说“那朵流星”。不过日语这么用的时候，底层逻辑还是没跑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框框；汉语则更喜欢用“一”加上一个本来不搭界的量词去制造画面感。另外，汉语口语里为了图省事，经常把量词直接砍掉，直接说“买两苹果”；日语量词在绝大多数语境下

则不可省略，这种省略与替代规则的差异，进一步折射出两种语言在形式严谨度上的不同追求。

四、中日量词使用差异的深层成因

（一）认知类型与习得机制的隔阂

语言结构的差异往往是认知方式差异的外化。汉语是孤立语，没有那么多形态变化，说话时得靠语序来排布。所以中国人在挑量词的时候，眼睛盯着的是事物外表长什么样——是大的还是小的，是长的还是圆的。日语作为黏着语，高度依赖助词标识语法关系，其量词选择更倾向于探究事物的内在类别与属性（如是否具有生命体特征）。这种“重外在形态”与“重内在属性”的认知偏好分野，直接导致了双方在量词搭配逻辑上的错位。

从二语习得的视角来看，这种认知错位极难消解。环境差异论与个体差异论虽能部分解释学习障碍，但信息加工理论提供了更深刻的洞察：母语与二语输入的时间差，导致大脑中两种语言的信息网络构建失衡。母语量词的使用能达到“无意识自动化”，当遇到目标语的量词时，学习者会本能地套用母语的认知框架去处理信息，结果就是系统性地说错。

（二）语法属性与句法地位的制约

量词在各自语言系统中的独立性强弱，构成了差异的直接句法诱因。汉语量词具有显著的相对独立性，不仅可以脱离数词单独表意（如对话中用“这件”指代特定衬衫），还能与指示代词自由结合成“指+数+量”结构（如“这一把”“每一条”），这种弹性是汉语独有的。反观日语，量词的附属性质极强，既不能独立使用，也无法与指示代词构成修饰关系，只能依附于数词构成封闭的量词短语。

在语义层面，汉语量词呈现出高度的多义性与语境依赖性。以“只”为例，在不同语境下可表示个体、少量甚至极低频率，其语义游移空间大^[9]。而日语量词系统更追求规范性与准确性，单个量词的语义指向相对单一，受上下文语义干扰较小。日语数人时还有“ひとり、ふたり”这种特殊的序数词变体，更增加了它系统的复杂度。

（三）文化底蕴与思维模式的投射

从历史源头看，汉语量词从殷商时期就开始萌芽，跟着度量衡制度一点点自然生长出来；日语量词迟至4世纪大和时代初期才以汉字传入为契机，通过直接引入汉语古量词并进行本土化改造而成型^[10]。

深层的文化心理与审美观念在量词分类上留下了深刻烙印。汉语量词的分类相对宽泛，一个量词常可兼容多种事物，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是重整体与综合的思维方式。这就催生了“一叶扁舟”“一泓秋水”等富有诗意与整体意境的表达。相反，日语量词的分类极为精细，同一事物常需根据具体情境切换不同量词，这映射出日本文化中对细节的极致关注与精确区分的

倾向。尽管汉语在历史上对日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日语在吸纳外来语言成分的同时，始终以自身的语言结构与文化心理对其进行过滤与重塑，使得中日量词在同源表象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五、结语

汉日量词的差异并非单纯的词汇对应问题，而是两国语言类型学特征、认知加工习惯与文化心理结构交织作用的产物。从分

类体系看，汉语的“名动二分”与日语的“语源多维”体现了不同的结构诉求；从功能表达看，汉语的灵活多变与日语的精准规整反映了各自语用策略的偏好。探究这些差异的成因，有助于突破传统对比研究中“静态罗列”的局限，将目光引向语言背后“人”的认知过程。在未来的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中，唯有引导学习者从机械的记忆搭配转向对目标语认知逻辑与文化审美的理解，才能真正跨越因量词误用而引发的交际鸿沟。

参考文献

- [1] 蒋乔俏. 针对汉语母语者的日语量词学习指导研究 [D].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 [2]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3]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 李庆祥. 日语量词详论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
- [5] 朱德梅. 量词“枚”的中日对比研究 [D]. 南京农业大学, 2014.
- [6] 李晓媚. 中日量词的比较研究 [J]. 科教导刊 (中旬刊), 2011, (22): 227-228.
- [7] 许玉岭. 汉日量词比较研究 [D]. 天津师范大学, 2007.
- [8] 吴炯炯. 汉日名量词对比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D].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 [9]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0] 白洁. 中日历史上量词比较的研究及展望 [J]. 黑龙江史志, 2014, (15): 359.